

# 1830—1850年代澳大利亚自由移民骤增原因探析

赵春丽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1830—1850年代,澳大利亚迎来其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自由移民潮。该时期自由移民潮的出现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19世纪英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及失业问题,而渐趋繁荣的澳大利亚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却在增大,两地就业环境的相对差异促使以英国为主的自由移民迁往澳大利亚;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及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颁行的自由移民资助政策,为无力承担高额移民成本的潜在移民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移民进程;而1850年代,澳大利亚的“淘金热”更是刺激了全球范围内自由移民的大规模涌入。

**关键词:** 澳大利亚;自由移民;“推拉理论”;自由移民资助政策;“淘金热”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94(2022)04-0118-07

DOI:10.16101/j.cnki.cn32-1749/z.2022.04.001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特别是自由移民<sup>①</sup>)之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可以说,澳大利亚的重要发展期皆与其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潮紧密相连。因此,有论者表示:“移民构成了澳洲的历史和社会,也改变了澳洲的历史和社会”。<sup>[1]</sup>1830—1850年代,澳大利亚迎来其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自由移民潮。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澳大利亚总人口(不包括原住民)从1830年的7万余人增长到1860年的110万有余。<sup>[2]533</sup>该时期的自由移民潮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带来了亟需的劳动力,而且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使其完成了由流放犯殖民地向公民殖民地的过渡。

长期以来,学术界非常重视澳大利亚移民问题的研究。国外尤其是英、澳两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已做过一些有益探索,他们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类型和影响,还将澳大利亚与其他移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sup>②</sup>国内学术界对澳大利亚移民史也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并产生了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仅研究专著便有王德华的《澳大利亚:从移民社会到现代社会》<sup>[3]</sup>、黄昆章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sup>[4]</sup>、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sup>[5]</sup>、《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sup>[6]</sup>等,学术性文章更是不胜枚举。综观国内学术界在澳大利亚移民领域的

收稿日期:2021-12-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830—1860年代澳大利亚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由移民研究”(KYCX22\_3246)

作者简介:赵春丽(1988—),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史。

①“自由移民”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流放犯移民而言的,与被强制驱逐出国的流放犯相比,自由移民能够自主地选择移民目的地,对财富的追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其选择移民的主要原因。

②相关研究成果如 Philip Payton and Andrekos Varnava. *Australia, Migration and Empire: Immigrants in a Globalised World*[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Geoffrey Sherington. *Australia's immigrants 1788-1988*[M]. Sydney: Allen&Unwin, 1990; Robin F. Haines. *Emigration and the Labouring Poor: Australian Recruitment in Britain and Ireland, 1831-60*[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James Jupp.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Woomera: The Story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Yukio Kawano. *Social Determinants of Immigrant Sel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M].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6.

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20 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移民问题,二是从本国视角出发关注华侨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状况及其对澳大利亚的贡献。与对战后澳大利亚移民问题研究的方兴未艾相比,国内学者对战前尤其是 19 世纪的澳大利亚移民问题的研究涉猎不多。本文以 1830-1850 年代赴澳自由移民为考察对象,结合当时英国国内的社会境况及澳大利亚的发展态势,尝试探析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自由移民骤增的原因。

## 一、英澳两地就业环境的相对差异所形成的“推拉”力

众所周知,影响移民行为的因素很多。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来自于迁出国的“推力”和迁入国的“拉力”的双向因素,<sup>[7]</sup>这就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著名理论——“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迁出地不利于人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表现为战争、天灾、失业、贫穷等因素;而“拉力”则是迁入地所具有的经济、环境、社会福利以及政策方面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机会,也可以是仅针对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sup>[8]</sup>回看 19 世纪 30-50 年代赴澳自由移民的迁移轨迹,“推拉理论”依然适用。

自 18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且这种增长态势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1801 年,英国人口总数已达 1050 万,此后每十年人口数量增加 200 万左右,到 1861 年时,英国人口数量已增至 2310 万(详见表 1)<sup>[9][151]</sup>。而一些重要的商业、工业中心的人口增长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伦敦,作为英国社会经济中心和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其人口在 1801 年就远超 100 万,至 1831 年又翻了将近一倍。<sup>[10][188]</sup>国内持续增长的人口,超出了英国当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再加上拿破仑战争后复员的约 30 万士兵和水手,<sup>[11]</sup>英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1826 年,英国移民委员会报告称:“在爱尔兰、英格兰和苏格兰广大地区,当地存在大量过剩人口,换句话说,那里存在大量超过当地工作岗位要求的劳动力数量的有劳动能力和健康的劳动力。”<sup>①</sup>

表 1 1801-1861 年英国人口普查情况(单位:百万)

年份	1801	1811	1821	1831	1841	1851	1861
人口	10.5	12.3	14.1	16.3	18.5	20.8	23.1

与此同时,经济的不景气更加重了英国国内就业形势的严峻性。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因一时无法转变战时经济模式,适应战后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经济遭遇了多次危机。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大规模的倒闭浪潮汹涌袭来”。<sup>[12]</sup>仅就银行业而言,至 1826 年,倒闭的银行已有约 60 家,1826 年至 1844 年间,又有约 100 家银行倒闭。<sup>[10]200-201</sup>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着社会就业情况,愈来愈多的劳动者濒临失业或处于失业之中。据亨利·梅休(Henry Mayhew)于 1840 年代对英国工人就业情况的调查,一般行业只有 1/3 的人能够充分就业,其余的人只能实现部分就业或常年处于失业状态。<sup>[13]</sup>国内劳动力过剩和就业不足加剧了英国民众的贫困和不安,推动着他们移居海外以求改善自身处境。1830 年,近 6 万人离开英国;1842 年时,离开英国的人数达到了 13 万人;至 1840 年代后期,每年都有超过 25 万人离开英国。<sup>[10]229</sup>

相比之下,作为英帝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不仅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甚至还显现出渐趋繁荣的态势。其中,牧羊业发展最为迅猛。1820 年,澳大利亚饲养羊的数量还不足 10 万只,但仅用了 10 年时间,到 1830 年,当地绵羊数量就增加到了 100 万只,<sup>[14]52</sup>1850 年更是达到了 1600 万只。随着绵羊数量的增加,澳大利亚对外出口的羊毛量也屡创新高,1820 年,其羊毛出口量近 20 万磅;至 1830 年时,已有 200 万磅;1840 年,达 1000 万磅;到 1849 年时,在英国 7700 万磅的进口羊毛总量中,澳大利亚所产的羊毛更是占了近一半,为 3500 万磅。<sup>[2]114</sup>牧羊业的发展带动了澳大利亚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澳大利亚各经济部门的兴起,数量有限且消极怠工的流放犯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劳动力

① 转引自何顺果《比较开发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版,第 274 页。

匮乏逐渐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此外,因劳动力严重不足,19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工人的薪酬普遍高于许多国家。仅以1854年为例,其时澳大利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出英国138%之多。<sup>[15]</sup>更多的工作机会,更丰厚的薪酬待遇,使19世纪的澳大利亚被许多同时代人视为“工人的天堂”<sup>[16]</sup><sup>187</sup>,这对饱受就业艰难之苦的英国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于是,在英国的“推力”和澳大利亚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英国自由民开始移居澳大利亚。据统计,仅1831-1835年五年间来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就达到了1.8万余人,超过了以往四十余年的来澳自由移民数。<sup>①</sup>根据1831-1860年澳大利亚移民数据,这一时期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总数高达64万之多。<sup>[17]</sup><sup>263</sup>

## 二、自由移民资助政策的推动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出于对国内劳动力流失的担忧,英国政府并不鼓励自由民向海外迁移。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人口的持续增长,愈益加重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问题日渐成为威胁英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牧羊业的蓬勃发展逐渐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殖民者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不仅仅是一个流放犯人的“海外监狱”,而且有可能成为英国工业生产的原料产地、投资场地和销售市场。在此背景下,向澳大利亚移民则成为减轻国内人口压力并进一步开拓殖民地的两全之策。于是,英国当局开始调整对澳移民政策,鼓励自由民移居澳大利亚。

1820年代,为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流向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及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根据自由移民所带来的资金和劳动力数量,向他们免费授予或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大量土地。这一鼓励移民的政策确实吸引了英国一些投资家的到来,但却无法有效缓解英国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反而导致澳大利亚大量土地落入土地投机者手中。据统计,1821-1830年间,来澳自由移民仅8525人<sup>[17]</sup><sup>263</sup>,而1822-1828年澳大利亚被免费授予的土地面积却是1788-1821年以来三十余年被授予的土地面积的四倍之多<sup>[18]</sup>。可见,尽管英国政府放宽了对自由民移居澳大利亚的限制,且澳大利亚的发展前景对深陷失业和贫困漩涡的英国平民也颇具吸引力,但在19世纪初期,移居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人数依然保持着较低水平。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由英国前往澳大利亚的高昂交通成本大大影响了潜在移民的移民意愿。英澳之间远隔重洋,相去甚远,在殖民开发的前50年,船只从英国航行至澳大利亚一般需要四个多月,如遇恶劣天气,花费时间更长。<sup>[19]</sup>因航行时间长,1830年前,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一张普通舱船票价格通常高达30英镑。后来,由于移民资助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船票价格降至12到15英镑,但即便是这样的价格,也与当时英国非熟练工的年收入差不多,且相当于从英国到美国船票价格的几倍。<sup>[16]</sup><sup>181</sup>此外,从英国移居澳大利亚的移民还必须能够承受相当于航程时长的失业状态。<sup>[20]</sup><sup>11</sup>如此高昂的移民成本往往是一般平民难以承受的。再者,尽管19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移民船只的监管已大大降低了乘客的死亡率,但在长距离航程中,极端的天气、无法避免的晕船、突发的疾病、难以预料的海难等对移民来说依然是充满危险的。如1845年,一艘由新南威尔士政府承包的载有369名乘客的“卡塔拉基号”(Catarraqui)在靠近菲利普湾港时消失不见。<sup>[21]</sup>鉴于以上因素,移民一旦踏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船只,便几无返程的可能,这让许多潜在移民在前往澳大利亚一事上更为犹豫与谨慎。

为破解劳动者阶层移民澳大利亚的困局,英国政府及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由移民资助政策。1831年初,戈德里奇依据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的“系统殖民化”(Systematic colonization)理论颁布了《雷彭条例》(Ripon Regulations,或译为《里彭条例》)。该条例规定从1831年起,以每英亩5先令的价格出售土地。出售土地所得用于资助女性移民澳大利亚,以缓解殖民地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sup>[22]</sup>《雷彭条例》以土地售卖制取代土地恩赐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指

<sup>①</sup> 据统计,1788年至1830年间,移居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仅1.57万人。参见 Simon Ville, Glenn Wither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81.

导性文件,意义重大。它不仅利用土地收入补贴移民的路费开支,帮助无力承担高额路费的普通民众抵达澳大利亚,而且以较低的价格公开出售土地的做法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自由移民移居澳大利亚。

19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政府及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扩大了资助政策的覆盖范围,资助对象由女性扩展到所有符合移民要求的自由人。同时,为鼓励更多的自由移民迁往澳大利亚,政府资助形式也更加灵活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奖励金制度(the bounty system)和直接补贴。在奖励金制度下,一些经政府批准的个人或机构(可称为“移民代理人”)负责招募和运输移民。成功申请到奖励金的移民的路费一般先由英国政府垫付,待移民被顺利接收后,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再向移民代理人支付一定数额的奖励金(每个移民的奖励金为18-19英镑<sup>[17]273</sup>)。若移民在航行中死亡,或因性格、年龄、健康、职业等问题不符合移民要求,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则不予支付奖励金。而直接补贴政策,是由英国移民事务总代理(the British Agent General for Emigration)包租船只,向殖民地运送移民。无论采用何种资助形式,受资助的移民通常只需支付1到4英镑的相关费用,<sup>[16]182</sup>这就大大降低了自由移民移居澳大利亚的成本。此外,为鼓励更多单身女性移居澳大利亚,改善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性别失衡状况,殖民地政府还专门为女性移民设置了额外的奖金,该奖金由最初设定的8英镑逐渐升至1836年后的16英镑。<sup>[23]</sup>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1832年至1850年间,新南威尔士殖民区获得资助的女性移民人数比男性移民高出15%。<sup>[16]182</sup>除政府机构资助移民外,一些准政府机构和慈善机构也参与到资助移民运动中来,如1852年成立的高地和岛屿移民协会<sup>①</sup>(Highland and Island Migrations Society)在1850年代便资助了5000名遭受饥荒的高地人前往澳大利亚。<sup>[24]</sup>

随着自由移民资助政策的渐次推行,英国自由移民的迁徙方向发生明显变化。1831年,英国98%的对外移民会选择横渡大西洋前往北美洲,但到了1839年,约有四分之一的英国移民选择前往澳大利亚。<sup>[14]67</sup>1831-1860年间,受政府资助来澳的英国自由移民多达357904人,其中1831-1840年间,受政府资助来澳的英国自由移民人数为43817人,是过去40余年自由移民总数的约2.8倍;1841-1850年受政府资助来澳的移民人数相较1831-1840年又翻了近一番,为83635人;1851-1860年受政府资助来澳的移民总数达到顶峰,高达23万人之多。<sup>②</sup>1831-1860年间,受政府资助来澳的英国移民人数占同时期来澳的英国移民总数的55.5%,其中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殖民区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以上(详见表2)。<sup>[17]15</sup>

表2 1831-1860年间受殖民政府协助来澳的英国移民比例

	移民总数	受资助移民数	受资助移民的比例
新南威尔士	174027	134547	77.3%
维多利亚	321470	114255	35.5%
南澳大利亚	106910	79388	74.3%
塔斯马尼亚	36077	25362	70.3%
西澳大利亚	6127	4352	71.0%
总数	644611	357904	55.5%

### 三、“淘金热”对自由移民的刺激

由表2不难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1831-1860年间,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四个殖民区受政府资助来澳的英国移民人数在各殖民区移民总数中的占比均在70%以上,唯独维多利亚的这一比例仅为35.5%。事实上,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受资助移民人数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中排列第二,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如表3所示,1848年,维多利亚受政府资助来澳的英国移民数占本年度移民总数的比例高达

① 高地和岛屿移民协会是一个旨在协助移民以解决苏格兰高地和西部岛屿的马铃薯饥荒的慈善组织,表面上它是一个独立的慈善组织,但因与政府关系密切,被历史学家汤姆·迪瓦恩(Tom Devine)贴上了“准政府组织”的标签。

② 该数据依据《1831—1900年受政府资助的英国移民人数总表》<sup>[17]265</sup>计算所得。

86%,但此后这一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1851年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至1859年,维多利亚受政府资助的移民人数在该殖民地移民总数的比例已降至20%。<sup>[17]23</sup>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1851年后维多利亚殖民地受资助移民比例的下降呢?答案是维多利亚的黄金刺激了大量自费移民的涌入。

表3 1848-1859年受政府资助进入维多利亚殖民区的英国移民所占的百分比

年份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1858	1859
维多利亚	86	78	53	59	35	31	34	31	30	20

1851年2月,英国移民爱德华·哈德蒙·哈格里夫斯(Edward Hammond Hargraves)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附近的夏山溪(Summer Hill Creek)中发现黄金;5月,《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正式对外公布在巴瑟斯特附近发现黄金的消息,该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殖民地,各殖民地赶往巴瑟斯特寻求黄金的人不计其数。为阻止本地人口的大量流失,维多利亚殖民区政府立即成立了黄金探寻委员会(Gold Discovery Committee),向在墨尔本周边320公里内发现黄金的人提供200英镑的奖励。<sup>[20]17</sup>很快,淘金者就在墨尔本附近的安德森溪(Anderson's Creek)和中部的克伦斯(Clunes)相继发现了黄金,随后又在巴宁扬(Buninyong)和巴拉腊特(Ballarat)发现了储量更为丰富的黄金。1852年初,拉筹伯(La Trobe)总督在与一位朋友的通信中写道:“我的整个殖民地似乎或多或少都充满了黄金”。<sup>[25]172</sup>

1851年至1861年间,澳大利亚的黄金产量在同期世界黄金产量的占比达到40%,时值约1.24亿英镑,其中维多利亚的产量居各地之首,约值1.1亿英镑。<sup>[26]</sup>1851年至1860年间,新南威尔士开采出多达200万盎司的黄金,而维多利亚同期的黄金产量是新南威尔士的十倍,<sup>[25]172</sup>总计23931718盎司。<sup>[27]</sup>仅1852年一年,澳大利亚对外输出的黄金价值就近1950万英镑,其中价值1700万英镑的黄金来自维多利亚殖民地。<sup>[2]129</sup>维多利亚殖民地丰富的黄金储量让人惊讶,以至于有人断言: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通过在巴拉腊特淘洗表层的黄金,每周都可以赚到20到40英镑。<sup>[28]</sup>当澳大利亚发现黄金的消息传播至澳、英之外的地区或国家时,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怀揣对财富的渴望,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向澳大利亚金矿区。

在黄金财富的巨大诱惑下,澳大利亚第一次取代加拿大成为英帝国移民的第二大目的地。<sup>①</sup>短短10年间,澳大利亚人口迅速增长,1851年,澳大利亚总人口为437665人,到1855年已达到793260人,4年间人口增加逾30万。1858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更是首度突破百万,至1860年,澳大利亚总人口已达1145585人。<sup>[16]563</sup>作为澳大利亚的主要产金地,维多利亚更是成为1850年代自由移民的首选之地。1851年维多利亚刚成为独立殖民地时,人口仅77345人;到1861年,该地人口已经发展到了近54万之多,约占当时澳大利亚总人口的47%。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总人口增长的65%左右都在维多利亚殖民地。<sup>[16]183</sup>当时澳大利亚第二大产金地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增长也很明显,从1851年的刚超过20万增长到了1861年的35.7万。<sup>[20]18</sup>金矿区更是成为19世纪中期接纳移民的中心地,如1851年底,维多利亚的金矿区已有2万淘金者,1858年,其人数达到最高点,为15万人。<sup>[14]79</sup>

“淘金热”时期,尽管自由移民资助政策仍在实施,但更多没有申请到移民资助或来不及申请移民资助的人宁愿自己承担高额路费,也要前往遥远的澳大利亚追寻财富,这在1850年代维多利亚殖民区的移民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仅从数量上分析,1851-1860年,移居维多利亚的受资助英国移民为87965人,远超其他殖民地受资助的移民人数,比排名第二的新南威尔士多了近3万人;然而,这些受资助的英国移民仅占同时期所有抵达维多利亚殖民区的英国移民总数的30.5%,<sup>②</sup>足见1850年代澳大利亚尤其是维多利亚殖民地“淘金热”对自由移民的影响之大。

总之,1830-1850年代澳大利亚自由移民骤增是多方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英、澳两地就业环境上的相对差异是促使大量英国自由民迁往澳大利亚的深层原因。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后,英国国内严峻的就业

① 在澳大利亚“淘金热”之前,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一直都是英帝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② 该数据是依据相关文献<sup>[17]263-265</sup>数据计算所得。

形势和澳大利亚经济的兴起推动着自由移民向澳大利亚的迁移。然而,移民澳大利亚的高额成本令众多平民望而却步。为降低移民成本,进一步推动移民进程,英国政府及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由移民资助政策。1850年代后,澳大利亚各地尤其是维多利亚掀起了一股淘金热潮,更是助推了自由移民的大规模涌入。此外,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改善、媒体舆论的宣传以及移民输出国国内局势动荡等因素也对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自由移民的骤增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 响。于是,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出现了其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自由移民潮。

#### 参考文献:

- [1] 戈登·福斯.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M]. 赵曙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33.
- [2] 戈登·格林伍德. 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 [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3] 王德华. 澳大利亚:从移民社会到现代社会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 [4] 黄昆章.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5] 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6] 张秋生. 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7] 潘光.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42.
- [8] 罗斯玛丽·塞尔斯. 解析国际迁移和难民政策:冲突和延续 [M]. 黄晨熹,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42.
- [9] FLINN M W.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imited, 1975: 151.
- [10] MCCORD N, PURDUE B. British History 1815-1914 [M].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1]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 非洲通史·近代卷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77.
- [12] 徐滨. 一八二五年英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及制度变革 [J]. 历史研究,2017(5):167.
- [13] HARRISON J F C.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1832-1851 [M].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79: 73.
- [14]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 澳大利亚史 [M]. 潘兴明,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 [15] WILLIAMSON J G.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Labour Markets Since 1830: Background, Evidence and Hypotheses [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95, 32: 178.
- [16] VILLE S, WITHERS G.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7] HAINES R F. Emigration and the Labouring Poor: Australian Recruitment in Britain and Ireland, 1831-1860 [M].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 [18] WOOLLACOTT A. Settler Society in the Australian Colonies: Self-Government and Imperial Cul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7.
- [19] 欧美斯特·斯科特. 澳大利亚史 [M]. 陈晓,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459.
- [20] MACLEAY V. Immigration Since 1788: The Making of Modern Australia [M]. Sydney: Trocadero Publishing, 2011.
- [21] HAINES R. Life and Death in the Age of Sail: The Passage to Australia [M].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3: 39.
- [22] MUIR K. About the Money: Australia's Economic History [M]. Sydney: Trocadero Publishing, 2001: 8.
- [23] HAINES R. Indigent Misfits or Shrewd Operators? Government-assisted Emigrant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Australia, 1831-1860 [J]. Population Studies, 1994, 48: 226.
- [24] HARPER M.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Labour Emigration to the "British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 Continuity and Change, 2019, 34: 47.
- [25] BASHFORD A, MACINTYRE 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6] 王宇博. 享受学问 乐在其中——王宇博论文选集 [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128.
- [27] 郑寅达,费佩君. 澳大利亚史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99.
- [28] RUSDEN G W.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ume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23.

##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apid Increase of Free Immigration in Australia from the 1830s to the 1850s

ZHAO Chunl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1830s to the 1850s, Australia ushered in the first large-scale wave of free immigration in its modern histor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free immigr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was experiencing a serious labor surplus and unemployment problem, while the booming Australia was in urgent need of a large amount of free labor. The relative differences in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places prompted predominantly British free immigrants to move to Australia.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colonial authority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subsidizing free immigration, which provided a convenient channel for the potential immigrants who could not afford the high cost of immigration, further facilitating this process. In the 1850s, Australia's "gold rush" spurred a massive influx of free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Australia; free immigration; "the push-pull theory"; the policy of subsidizing free immigration; "gold rush"

---

(上接第 90 页)

[3] 王良. 王心斋全集 [M]. 陈祝生, 等校点.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4] 陈来. 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25.

## On the Dimension of Wang Gen's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Practice Approach

ZHANG Aip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e approach is a philosophical category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its connotation is the moral action of moral subject to improve the realm of self-cultivation.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is treated as a consecutive clue in the scope of the practice approach. It is natural to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was first explicitly put forward by Mencius, who thought that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was the fundamental means to search for the lost heart in the face of the material desires' obscuring of one's own hear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encius, Wang Gen's theory of the practice approach obviously has the thinking direction of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It is embodied in the idea of "turning saint" by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 the idea of practical viewpoint in the scope of daily routine, and the thoughts of practicing the natural principle of the conscience's method bonded between true happiness and realization. It is of a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Wang Gen's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practice approach.

**Key words:**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Wang Gen; practice approach